

## 略述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

谭艳萍

**摘要** :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形成于 19 世纪 60~70 年代。这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内容有“坚守条约的和平外交思想”,“自强为本”的实力外交思想,“遣使设领”、“保护华侨”以及主张实行“均势外交”的外交策略等等。从三方面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略述。

**关键词** :丁日昌 ;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 ;社会关系 ;地域

**中图分类号** :K25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44X(2003)01-0064-03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广东省丰顺县汤坑人。他虽然不是专门的外交官,也没有出使过西方国家,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但却“谙熟洋情”,办理了众多的对外交涉事件,并就对中外关系问题多次向朝廷建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的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仅对其外交思想的成因作一初步的探讨。

### 一、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

丁日昌对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是其外交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外交是“天朝上国”以理藩对待外来民族,“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仍守着“天朝”的威严,并力图恢复传统的“华尊夷卑”的国际秩序。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地赔款、主权进一步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国内外形势出现了巨变,尤其是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以日本侵略台湾为发端,造成中国边疆危机加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为了挽救危亡的清朝统治,清政府内部一批关心时局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几千年来所未曾有过的巨变,面临着从未遇到过的强敌”。并已明确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这场变化的根本原因,于是不得不重新估计华夷的国际地位,逐渐抛弃传统的夷夏观,向西方学习国际公法等等,开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原则,从而促使外交思想从传统向近代转变。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就是建立在这种中外关系格局变化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 1、认识到西方国家及潜在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

丁日昌对于时局即常常发出“多事之秋”<sup>[11] ①4</sup>的感叹。早在 1863 年,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炸弹局时,就向李鸿章建议设厂造船并提出“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的主张。(《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台湾中央研究院编,第 4 页)1867 年,他又指出:“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其器械精奇,不惟目见其利,且身受其害。”<sup>[12]</sup>1875 年他在《海防条约》中又进一步写道:“天下大变之来,方

如烈火燎原,毁家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sup>[13] ②23</sup>丁日昌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局”完全是外国侵略所致。因此,他十分关注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军事侵略。他是这样分析中国的边疆形势:“法据安南与我云、贵、广西毗连,英占印度,与我云南、四川边境相接,俄占据黑龙江以北,染指新疆、包裹我东西两端,东南沿海数省更为洋船随处可到……从古中外交涉,急于陆者恒缓于水,固未有水陆交通,处处环伺,如今日之甚者也。”<sup>[13] ②15</sup>他在《临危口授遗折》中还写道:“方今时局多艰,西、北、南三境皆与英、法、俄接壤,东又有日本狡然思逞,伺衅而动,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机固有稍纵即逝者。”<sup>[14] ②274</sup>因而极力呼吁“……惟望内外臣子,仰体圣怀,同力合作,迅图自强之实事,勿分畛域,勿惮浮言。”<sup>[14] ②275</sup>丁日昌对世界形势的这种认识,足以体现他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自强的要求,与同时期一般士大夫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较早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还在 1864 年,丁日昌就认为:“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蔽。”<sup>[14] ②117</sup>1867 年,在《上曾候自强变法条陈》中再次就日本的侵略企图发表见解:“日本自与西人通商之后,立意自强……现在驾驶轮船自船主管炉以至水手皆无须雇用西人,关口亦无须延西人管其税务……中国所买枪炮,皆日本选余之物,以为欲东略欧米各部,则鞭长莫及,然则彼之生聚教训,秣马厉兵,其志果何为哉?”<sup>[12] ②25</sup>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朝野之中实为鲜见。病退之后,丁日昌还心系日本对中国之威胁,呼吁国人要加倍警惕和防范日本,“亟谋自强”,作好反侵略的准备。遗憾的是清政府统治者当时并未对此加以重视,其结果先是 1874 年日本侵台引发边疆危机,进而于 1894 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这正好验证了丁日昌的预料。

#### 2、认识到建立新的中外交往方式已成必然趋势

丁日昌认为,当时清政府对外正面临“邻气日逼”之势,而国内却是“积习太深”的“穷极之时”。所以,当务之急就是

“变通”。对外则要变通交往方式,告别闭关自守的状态。在1864年,他就指出:“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拒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关不出为长久计。”(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丁日昌不但认识到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且还认为外国的侵略又给予了中国以挑战的机会,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学习西方,迎头赶上。“取其所长以利于我”,(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从而发出对外“虚与委蛇”,力保和局,对内则“卧薪尝胆”图谋自强的呼声。为了阐明自强的迫切性,丁日昌进一步分析:“我不能自强,则彼族得合群力危我;一能自强,则彼族之轮船飞炮、精甲利兵,皆我他日兼之资也。故曰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也。”<sup>[41]</sup>这些见解充分体现了丁日昌的外交眼光和谋略。

## 二、广泛的社会关系

丁日昌一生交友甚多,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 1、曾国藩、李鸿章的影响

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晚清重臣,在西方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代表清政府办理过许多对外交涉。基于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状况,他们奉行“和戎”、“信守条约”的外交原则。曾国藩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sup>[51]</sup>主张“驭夷之法,羁縻为上”。<sup>[61]</sup>李鸿章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sup>[71]</sup>不可否认,他们所奉行的外交原则有着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一面,但在当时的中国处于任人宰割的情况下,就连和局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利害不同的侵略者之间周旋,以免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外交原则是适时的,可行的。再说“信守条约”这一外交形式,也是符合国际法关于条约一经议定批准生效,双方必须遵守的原则。“和戎”也好,“信守条约”也好,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争取和平环境,发展国家实力,以抵御外国侵略。他们认为只有国家强大起来,才能在对外交涉中坚持强硬态度,打击强权列强,维护国家主权。丁日昌作为一名封疆大吏,以其“于洋人性情最为熟悉”(引自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72年,第96页)的特点,直接办理了许多棘手的涉外事件,深受曾国藩、李鸿章的赏识、提拔和支持。丁日昌在外交实践中,也强烈地认识到,在中国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与西方国家进行直接军事对抗是万不可行的。他说:“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绌。”<sup>[81]</sup>并且“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迫,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司洋器为自强之本。”(引自《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4页)唯一的出路只有“外则虚与委蛇,内则力图整顿”。<sup>[4]</sup>尽快增强国力以达到国强。所以,他所执行的外交原则是“和戎为方,自强为本”、“信守条约”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李鸿章外交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 2、容闳的影响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曾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公使,对中国早期的对外关系发展有过较大的贡献。丁日昌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与

容闳关系密切,容闳在《西学东渐记》里称丁是其“老友”及“志同道合者”。丁日昌的外交思想受容闳的影响很大。现重点列举两项:第一,对基督教及教案的认识。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侵略活动遭到了容闳的坚决反对。在1868年他向朝廷转呈的条陈中就写道:“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sup>[91]</sup>丁日昌一生经办了多起教案,在对基督教的认识及对教案的处理方针上,他受容闳的影响很大:一方面,能以较宽容的态度对待西方宗教,而不是将其简单地视为有“淫心兽行”的邪恶团体。另一方面,对外国教会在华的侵略活动进行强烈的谴责和抵制。尤其是丁日昌在办理天津教案期间,容闳正担任丁日昌的随员,所以这种认识和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容闳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深刻地了解到华侨华人在海外的遭遇以及他们思念自己家乡的感情。“当1855年,予初次归国时,甫抵澳门,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工,以辫相连,结为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及今思之,犹为酸鼻。”<sup>[91]</sup>这种认识就直接影响着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的形成。1867年,丁日昌向朝廷建议派使“赴各国华人处所”<sup>[21]</sup>专门处理华侨问题。这一建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但可以说是丁日昌护侨思想和侨务观念萌芽的体现。后在1875年,丁日昌在担任中秘换约钦差大臣期间,又直接利用容闳赴秘鲁调查华工状况的报告,就秘鲁公然践踏中秘新订条约中关于保护华工的条款、虐待华工的事实同秘使进行谈判。由于丁日昌据理力争,终于迫使秘方作出保护华工的保证,使在秘华人的状况大有改善。毋庸置疑,丁日昌这次外交活动的胜利是与容闳的影响分不开的。

### 3、王韬的影响

王韬是丁日昌的终生挚友,曾在上海英国教会墨海书馆任职,后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译书,再后被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了法、俄等国。这些经历使他对西学有较深的认识,对丁日昌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首先,1864年,王韬将自己与黄达权合著的《火器略说》一书寄给丁日昌。后又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首次阐明了鸦片战后中国所面临的“古今变局”的观点,提出了“握利权”、“树国威”的自强主张,并强调西方入侵中国,有害有利,如“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而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sup>[10]</sup>这些见解就为丁日昌认识“变局”和采取应变之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1870年,王韬又将他所著的《法志》、《俄志》、《普法战纪》寄给丁日昌,使丁日昌加深了对欧洲国家的了解,这就有助于他形成一系列外交政策。1867年,丁日昌在《自强变法条陈》中提出了一些有创见的外交策略,如“设新闻报馆”、“在各国有华人处设立领事”等等,实际上都是来自王韬的主张。另外,丁日昌于1875年所写的《海防条约》也是以王韬的思想主张为根据的。最后,光绪元年,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局任职内,又按王韬的建议“设肄习舟师馆和翻译西书馆”,<sup>[11]</sup>“广译各国史事等书,并购觅缅甸、印度等国地理图说加以翻译”。(引自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9页)这就为丁日昌进一步了解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便利,而这些又都是其外交思想得以形成不可缺少的条件。

### 三、地域的影响

1、丁日昌籍隶广东潮汕地区。“丁日昌出生于广东省丰顺县,丰顺县在历史上属于潮汕地区。潮汕地区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濒临南海,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东北面与福建省相毗连,海域广阔、海岸线绵长,所以与海外联系较早,也较多,当时海上贸易也较兴盛。<sup>[4] ①-2</sup>这样的地理位置就使丁日昌能较早地接触西学,并认识世界的发展变化。

时至19世纪中叶,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潮汕地区遭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潮汕地区的侵略。丁日昌作为一个潮人,凭着自小就与外界接触的经验,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列强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趋势,从而积极地谋求应变之方法,这就为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丁日昌历任于沿海地带的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地区与海外接触最早,中西关系也最为密切。同时,又都是较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居,中外冲突较多,处理也很棘手,尤其是上海。丁日昌在担任上海道台期间所处理的中外冲突事件在他的宦官生涯中数量最多。这些外交实践使丁日昌深感列强的“蛮横无礼”,也深感中国“积弱已深”,无法与列强硬拼的事实。从而产生“自强为本”、“遵守条约,并随时不忘以实力为外交后盾”的一系列外交原则和方针,并运用这些原则和方针指导外交实践。

可见,丁日昌籍隶广东以及历任沿海省份的经历,使他能熟悉中国沿海地理情形和防御情况,明了中外形势的发展

变化,从而成为其外交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

(作者单位:湖南师大)

#### 参考文献:

- [1]丁日昌.抚吴公牍(卷40)[M].光绪三年刊,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重刊.
-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M].北京:年故宫博物院影印.1930.
- [3]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M].光绪辛丑年上海久敬斋铸印,文海出版社.
- [4]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 [5]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29)[M].光绪2年,传忠书局刊.
- [6]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M].光绪2年,传忠书局刊.
- [7]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29)[M].光绪26年,莲池书社本.
- [8]丁日昌.丁禹生政书[A].抚吴奏稿(卷5)[C].香港:海宝全电脑排版植字有限公司,1987.
- [9]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10]张磊.丁日昌研究[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 [11]邓亦兵.丁日昌评传[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上接第63页)

了潜在威胁,科技进步使分工细化,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是社会环境把科技这个手段工具过程当成目的来追求,一味求新、求奇、求高,如科幻片中制造出的异类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甚至将人类当成奴隶,这个虽不是现实,但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科学文化理念就在协调科技与人的发展方面起桥梁作用,使人自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与方法,将科技传播与道德建设同时进行,这是现时代人类全面发展的新机遇。

#### (三)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的推动,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科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在其中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社会在科技的合理创新运用下实现发展,当然自身于其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科技创新关注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科技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又为科技创新创造动力,从而两者实现良性循环。

因此,科学文化理念的兴起意味着一场新的文化革命正在生成。说它是静悄悄的,是因为这场革命是个渐近的、渗透式的、濡化式的过程。它既适应了科技发展的文化要求,又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技基础。在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愈加关注精神生活,在关注当前生存境遇的同时,又更加展望

人类的未来,从而在整体系统的视野中把科技的力量与文化关怀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为人类开创美好未来奠定了可靠的文化范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 参考文献:

- [1]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8.
- [2]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6.
- [3]孙慕天,刘玲玲.两种文化问题的历史考辩[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33-40.
- [4](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120-129.
- [5]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38.
- [6]韩璞庚,陈建涛.论科学文化及其形成条件[J].学海,1994,(3)21.
- [7]李耀平,李毅.论科学文化的精神功能[J].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1)4.
- [8]李康.试述科技文化的静态特征——对科技现代化的文化思考[J].学术论坛,1998,(4)51.
- [9]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35.